

汤伏祥

著

# 袁

# 来如此

——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

依真实档案资料，采名家研究成果，生动记述袁世凯真相  
袁世凯研究专家骆宝善、袁世凯之孙袁家诚作序推荐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来如此——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汤伏祥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80170-969-1

I. ①袁… ②袁… II. ①汤… III. ①袁世凯 (1859~1916)—生平事迹—通俗读物 ②中国历史—清后期—通俗读物 IV. ①K827=52  
②K25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2997 号

出版人 周一  
责任编辑 胡志华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mailto: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118 幅 18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 序

《袁来如此——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是青年编辑汤伏祥先生写的关于袁世凯其人其事的第二本书。这个题目与其第一本书《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都是十分有意义的选题。大处着眼，力图捕捉观察袁世凯现象的本质。

清王朝最后三十年，从败落到灭亡，同袁世凯的升腾并达到其不可企及的顶峰，恰成一对对称得十分完美的曲线：清王朝由同光中兴，一败于甲午，再败于庚子；一摧折于戊戌维新，再困于立宪逼迫，最后宣布于事无补的十九信条；袁世凯则由布衣从军，而洋务新秀，而新政中坚，而成就其非袁莫属。它们的交汇点就是清皇室发布经过袁世凯改定的逊位诏书、袁世凯发布共和为最佳国体的通电。袁世凯见证了清王朝垂死挣扎的全过程，导演了它的寿终正寝。

然而，清王朝迅速终结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袁世凯权术的高超、权力的膨胀，而是举国上下、朝野内外对清廷的信任危机，即所谓“气数尽了”。最具说明意义的历史现象是，革命军兴，东南、西南乃至西北各省的光复，几乎是兵不血刃，各省督抚疆吏，将军提镇，新练陆军的镇、协统，率皆望风迎降，没有婴城固守者，亦鲜有奋起率师“勤王”者，南北各省士绅更无一人团练自卫者。其形与势都与六十年前镇压发捻，形成巨大反差。清王朝丧失了当年的底气。朝野内外，都把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寄托在袁世凯一人身上。其成功之无望是不言而喻的。

数月之间，袁世凯不仅未能让清王朝起死回生，而且还堂而皇之地亲自取代了它。于是乎神话其能量的想象，与鬼化其行事作为的描述便相伴而生。坊间小说，严肃史籍，乃至教科书都不能免俗。

史籍说，革命党武昌起义，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任湖广总督，对付革命军。袁的盟兄徐世昌从北京来到洹上，二人密谋，以清廷委以全国水陆各军指挥编制全权，拨付巨额军饷，召开国会，实行责任内阁等为条件，提出要挟，倘不得满足，拒不出山。其实，史实并非如此。武昌起义第四天，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并派阮忠枢前来洹上劝驾。当晚，洹上经过激烈辩论，袁世凯最后决定应诏出

山，次日拜折谢恩。其时，徐世昌是清朝内阁协理大臣，即副总理。他没有密来洩上，更没有二人伙同密谋提出攘夺中央军政大权的出山条件。袁拜折出山，确实是提出了条件的，其内容是，征调北洋续备兵、预备兵组建一支自己指挥的军队，调集一批非现役的将弁任统领，请拨军饷，陆军部、军咨府对其军事行动不为遥制，等等。袁世凯作为逐臣起复，出任一方统帅，兵无一卒，将无一员，饷无一文，这些条件是自然合理的。不为遥制亦为时局所必需，且并无以攘夺中央军政大权为筹码之意。相反，就在袁致电内阁通报确定南下督师启程日期之前，还特地一连两天两次长电内阁，建议恢复设立军机处之类的机构，以加强中央统一指挥的权力，并无任何觊觎中央权力之意。至于坐看荫昌调动指挥不灵而拒绝出山，要求清军缓攻武昌之说，则更是无据之臆断。荫昌南下武汉已在袁拜折出山之后。缓攻武昌，那是荫昌到达前线之后的主意电告袁世凯的，袁只是以会办军务同意而已。

袁世凯出山之后，在公私场合都一再表示，打一两场胜仗不难，难在全国消灭革命力量。因而他清楚明白，不能以当年对发捻之策对付革命军，只能弃“剿”为“抚”，以自己的声望为前提，临以军事威慑，同革命军进行和谈，以君主立宪作为双方共同接受的底线。在他应诏出山伊始，就在进行这种试探，就任内阁总理后，便正式开始南北议和。历史拐点的这一节史实，应当重建。

汤伏祥博采诸家之说，参以自己的解读，通俗地阐释了袁世凯于晚清三十年间的各个方面，对于文史爱好者认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当会裨益良多。在袁世凯与近代中国的研究命题下，又一本新的成果产生，也是可喜可贺的。

骆宝善  
2011年1月

## 序

父亲袁克坚系先祖世凯第十子，母亲陆毓秀是清末陕西督军陆建章之女。本人自幼喜读中国历史文学书籍，而且对中国历代的英雄忠臣万分敬佩，并因与其同属中华民族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史书——本身就是对已逝岁月里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和他们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真实记载，决不允许有半点的虚构和歪曲，否则将不能称其为历史。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直书历史，映现的是史官的公道，还原的是历史的真相。如此，才能在记录之时，为包括被记录人在内的世人所景仰；在书成之后，成为后人修身治世的借鉴。近则督导为官之道，远则弘扬家国正气。

随着大量历史文献的解密，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史学家，对于并不遥远的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本着还历史和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求实态度，发表和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和著作，作出了许多符合历史实际、有价值、有意义的评论，厘清了那些道听途说的不实传闻、想当然的臆断，以及无意的附会或有意的伪造。

2009年我曾读过汤伏祥先生撰写的《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一书。该书汇集了七位与先祖有关系以及有密切交往的不同身份的外国要人对先祖的评价，把这一段真实史料介绍给读者，使人们从另外一个观察角度丰富了对袁世凯的认识。

汤伏祥先生撰写的这本著作，同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对被书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受教育以及思维方式作出了历史的、设身处地的考察和理解，对由此而引发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举止作出了合乎历史的真实叙述和评价。

对于汤先生的写作态度我再一次表示深切的感谢和崇敬。愿史学界涌现更多的“太史简”、“董狐笔”。

袁家诚（袁杰）

2011年3月于天津



# 目 录

## 第一章 袁世凯与甲午之战/3

甲午之战是近代中国最为耻辱的战争之一。有人说，是袁世凯引来了这场战争。然而，他是否在实际上促成了那场战争，至今仍是莫衷一是的问题，但至少说明袁世凯与这场战争的爆发有某种关系。

- 厕身军界，崭露头角/4
- 机智果敢，可谓能矣/8
- 驻朝总理，正名身份/12
- 专横跋扈，引来不满/16
- 阻朝联俄，操纵外交/19
- 培植事大，与朝不睦/23
- 发展商务，维护华商/26
- 贷款示惠，控制海关/30
- 矛盾激发，日本虎视/33
- 失策苦撑，仓皇回国/36

兼办抚辑，难逃失败/40

## 第二章 袁世凯与维新运动/45

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长时期以来，人们把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结为袁世凯的告密所致。但后来的史实证实袁世凯告密是在慈禧发动政变之后，客观地讲，袁世凯的告密行为不是引发政变的直接原因，但加剧和扩大了慈禧的镇压行动。鲜为人知的是，袁世凯与维新运动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众人举荐，重得赏识/47

万言新政，耳目一新/51

小站练兵，创新军制/60

严肃军纪，培植势力/65

练兵有成，声名鹊起/69

维新蓝图，真知灼见/72

戊戌政变，背来骂名/76

负疚不安，认真行事/79

巡抚山东，剿灭民团/84

推行改革，新政初显/89

## 第三章 袁世凯与晚清新政/95

晚清新政是近代中国的系统改革，也是一段值得国人永远铭记的政改历史。晚清新政是全面、系统的。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几乎同时进行了教育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袁世凯作为晚清重臣，在晚清新政中，较一般大臣更为积极。改革的“有形成果”和“无形成果”，相当一部分是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完成的。

东南互保，庚子获利/96

直隶总督，势力大增/100

新政主张，切而易施/105

整饬吏治，革新痼弊/109

扩充北洋，强盛军力/114

警察制度，一手操办/118

司法改革，首推其功/124  
狱政改良，风气之先/129  
废除科举，兴办教育/133  
注重人才，鼓励留学/139  
发展经济，倡导实业/142  
财政金融，样样作为/146  
振兴农务，极为尽力/150  
铁路交通，一番作为/154  
外交手腕，传李衣钵/159  
主倡立宪，开明政治/164  
多事之秋，下野归乡/169

#### 第四章 袁世凯与大清落幕/173

虽属被逼无奈，但清廷并没有完全被敌手击败，京城也未曾被攻破，甚至在还有能力控制战火的情况下，清朝却谢了幕。不是你死我活的战火，把清朝葬送火海的；而是历史的潮流、民意的力量，要让这个王朝随之东去，要让整个帝国制度随之东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不是完全依靠武力解决一个王朝的归宿，而且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袁世凯对这个帝国制度的谢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清闲垂钓，关注局势/174  
思想传播，暗中支持/178  
时局危急，重新出山/181  
内阁总理，重掌大权/185  
观望时局，艰难谈判/189  
审时度势，附和共和/194  
优待皇室，大清落幕/198  
功过是非，任人评说/202

#### 后 记/205



## 第一章 袁世凯与甲午之战

袁世凯在朝鲜的作为，已经被我们渐渐淡忘了。从1882年壬午之变时去朝鲜，到1894年回国，前后在朝鲜十二年。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正是中日关系最为复杂，也是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日中都把朝鲜作为角逐、较量的战场。年轻气盛的袁世凯极力维护大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为巩固中国在朝鲜的利益，为抵制日本对朝鲜的不断吞噬，可谓尽心尽力。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形是：一人敌一国，是爱国志士之行。也正因为如此，有了后来中日的甲午较量。

甲午之战是近代中国最为耻辱的战争之一。腐朽的清王朝，虽然经过洋务和自强运动的发展，表现上看似乎还比较强大。但制度已腐烂，远落后于已经迈入现代化的日本之后。甲午之战是日本野心的集中爆发，日本明治维新后，势力强大起来，逐步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不断向外扩展，窥视台湾及大清朝贡国琉球、朝鲜。1871年至1874年，日本虽然侵占台湾没有成功，但随后侵占了琉球。接着，又借助事端，挑拨朝鲜独立，想进而侵占朝鲜。其时大清已经丢了琉球，自然不愿失去朝鲜，遂与日本不断角逐、较量。袁世凯从1882年壬午之变时去朝鲜，到1894年回国，前后在朝鲜十二年。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正是中日关系最为复杂，也是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日中都把朝鲜作为争斗的战场。年轻气盛的袁世凯极力维护大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为巩固中国在朝鲜的利益，为抵制日本对朝鲜的不断吞噬，可谓尽心尽力。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形是：一人敌一国；也有人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sup>①</sup>。虽有夸张，但大抵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也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的手腕不免专横、霸道，有些也为朝鲜所不满。而日本侵占朝鲜，进而侵扰中国，尤其是侵占中国台湾的战略已定，所以不断充实军力，鼓动军国情绪，借机制造事端，挑起战争。甲午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有人说，是袁世凯引来这场战争，“他是否在实际上促成了那场战争，至今仍是个莫衷一是的问题”<sup>②</sup>。虽然这说法并无实据，因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只是以什么作为导火线而已，但这也至少说明袁世凯与这场战争的爆发有某种关系。

## 厕身军界，崭露头角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国门被打开，但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桩偶然的历史事件，天朝之国的心态还牢牢占据统治主流。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再猛敲了几下这个“中央之国”，于是乎就有了“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自强运动先从培养人才、推行军事现代化和工业化开始，建立翻译馆、新式学堂及派遣留学生等来吸纳西洋的火器、机器、科学知识等。接着，又开始把眼光投向实业，诸如轮船，铁路、开矿、电报等，以发展企业，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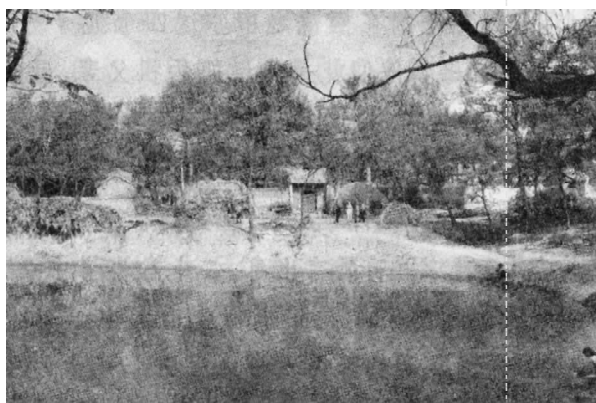
<sup>①</sup> 郭廷以语，转引李刚：《大清帝国最后十年：清末新政始末》，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sup>②</sup> 帕特南·威尔著，秦传安译：《帝国梦魇——乱世袁世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强财富，提升国力。自强运动，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挣扎，应该为我们现代人所尊重，但此时的世界，是帝国主义强化的时代，它们不会坐视中国的自强，纷纷前来破坏，特别是自强运动的中后期。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及1879年吞并琉球群岛；1875年，英国试图打开云南大门；1871~1881年间俄国强占新疆伊犁、法国攫取安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意气风发的袁世凯无味于科举，投身军界，效命疆场，安内攘外。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袁世凯带着他的家仆王成和乡邻赵国贤前来投奔吴长庆。袁世凯厕身军界，既是无奈之举，也是兴趣所向。袁氏家族本是书香门第，曾祖袁耀东中秀才，实现了科举考试的真正起步。叔祖袁甲三二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九岁连捷进士。祖父袁树三、叔祖凤三、重三也都中秀才，成了廪生、贡生。到了袁世凯的父辈，有袁保恒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保龄、保庆（袁世凯嗣父）中举人，保中（袁世凯生父）取副贡。袁世凯的父辈们，当然也非常希望袁氏家族的第四代子孙们能继续走科举考试取功名这祭正道，于是他们更加重视家学。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袁保龄在北京设立了专门的私塾学校，供自己的女子们上学。袁世凯、袁世廉等也被从河南项城带到北京学习。因为他们多希望袁氏子孙们，能通过科举之路，跻身正道，光宗耀祖，形成大望族。要想博得功名，成就一番事业，科举在当时无疑是正道，甚至是唯一的道路。可袁世凯两次科举，均以名落孙山而告终。虽然，对于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科举之路还漫长，两次失败，也并不能完全说明什么问题，许多学人是考了大半辈子都没中。但两次科举的失败，显然打击了袁世凯的信心，使袁世凯对科举有了怯意和无奈之感，自觉无窍于科举。这也是为什么，当他接到吴长庆之信后，就抛下妻儿，远走他乡，前来投奔了。另一方面，袁世凯对军务也多有热衷，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安于本分的人。早年跟随嗣父在南京的时候就十分淘气顽皮，整日结伙习武斗殴，骑马闲逛于南京各名胜闹市，甚至结伴冶游青楼。一个平日喜欢走马试剑的人，成天困在笔砚之间，其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人是有天赋的，有人善于科举应试，有人善于挥刀弄枪。袁世凯投身吴长庆后，吴出于爱护，希望他安心攻读，再次应试，并让幕僚张謇、周



袁世凯出生地——袁张营袁府旧址

家禄辅导他。袁世凯本想谋个差事干干，但吴长庆的一番好意，又不能不领，于是就在军中跟张謇、周家禄学文章。因为科举在当时毕竟是正途，也是最高欲望。袁世凯确实也努力了，他也想中举，给自己争些脸面。但他的天赋似乎不在科举应试，而在谋事。侯宜杰的《袁世凯三部曲·第一部逞威属邦》中有这么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袁世凯谋得庆军营务处差事后，就想有一番作为。军中那些枯燥无味的教条，他都认真研读。他对庆军中将骄兵惰的风气感到不满，决心整治整治。当时，有两帮人马因为赌博打了起来，为首的是一位叫梁大海的人。梁大海平日里就经常聚赌打架，他所在部队的营官也以有功自居，军纪散漫，对部下多放任自流。两帮人马赌博打架，正好给袁世凯以整饬的借口，当好好把握。袁世凯假借吴长庆之命全权处理。他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后，就下令把梁大海给砍了。本来有不少人还不拿袁世凯当回事，结果梁大海人头落地，大家都被镇住了，知道军纪的厉害了。

对于整饬军纪，袁世凯还有他更刚毅、果敢的一面。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之变，袁世凯随庆军入朝。庆军入朝后，纪律很不好，不但任意抢劫朝鲜居民的衣服食物，而且强奸民女事件也有发生。袁世凯知道这样下去，必将引起朝鲜人民的反抗，也有失“上国”之体面，因此就力主整军。袁向吴长庆说明利害，同时自愿担负这个责任。在吴长庆的支持下，袁世凯首先从各营抽调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兵，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袁亲自率领，日夜巡查，遇到那些扰害人民的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下面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一是，一次七个勇丁抢了朝鲜老百姓的东西，结果正被袁世凯撞见，袁世凯就拿出大帅吴长庆的令箭，把这七个勇丁给喀嚓了。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七个勇丁确实应该受惩罚，但罪不致死，袁世凯在没有征得吴长庆同意的情况下，一下子就杀了七个勇丁，确实让大家都震惊了。二是，黎大德、冯小武两兵无视军纪，居然把一朝鲜女人奸杀了。袁世凯知道了，找这两人审讯，两人先是不招供。袁世凯把两人分开，先是许诺冯小武只要他说出真相，可保一命，冯就把奸杀之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了；然后再找黎大德说，冯小武都招供了，并让他们对质。他们彼此揭露后，真相自然大白。这下他们才缓过神来，明白上了袁世凯的当。时袁世凯才二十出头，就有如此手段，确实令人佩服，相比如今的年轻人，二十出头还懵懵懂懂，而袁世凯已成熟有加了。庆军也经袁世凯整顿，“纪律一振，即袁爪牙辈亦大悚惧，韩境稍安，吴大奖袁能办事云”。<sup>①</sup>

袁世凯厕身军界，办事果敢妥当，很快就展露了头角。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

---

<sup>①</sup> 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轻人，不仅血气方刚、果敢、耐吃苦，而且办事周密、善用心计。当年他初到庆军营务处时，就善于利用关系，找了郭春芳等人练习射击技术，还利用各营监督训练、考核和稽查的机会，认真观察学习，掌握了各种营规以及射击、刺杀等技术。这也为他后来直接指挥作战，奠定了基础。所以，壬午之变后，袁世凯放弃了科举（虽然他也非常想从科举中博得名），追随吴长庆到朝鲜。吴长庆仓促出发，军务繁杂，一切筹划都依赖张謇及其助手袁世凯。袁世凯当时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勘定行军路线等。当大军在登州进发时，袁世凯就跟朝鲜官员金允植说，他想提劲旅数百，直接入京城（金允植虽说到仁川



吴长庆

后再观机酌行为好，但对袁的魄力颇为敬佩，后两人交往甚为密切）。船抵朝鲜马山浦，一营官说多数士兵晕船，请稍缓登陆，吴长庆立即将此人撤职，命袁世凯代理，袁马上部署，两小时内完成了登陆行动，吴当众大加夸奖。登陆朝鲜后，袁世凯因为赶路快速行军，脚板都裂开了口，直流血。但他依然不敢有丝毫

懈怠，顽强地坚持着。同时行军的丁汝昌就说：“纨绔少年，也能这样，真不容易呀！”<sup>①</sup>年少纨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都自以为是富家子弟，只懂炫耀自己。袁世凯厕身军界以来，就一改纨绔形象，吃苦耐劳、勤快勇敢，这也是袁世凯别于一般纨绔子弟之所在。



大院君李显应

后来，大家在合议如何处理大院君李显应时，袁世凯所处地位虽然低微，但贡献不小。“诱擒大院君之议虽出于薛福成，但临机决策，张謇的贡献亦大，袁则在实际的行动方面出力颇多。”<sup>②</sup> 吴长庆先拜访李显应，“好言诱之”，李去戒备之心，次日驾临黄仕林营中答拜。吴长庆等先诱其入帐慢谈，袁世凯则以计阻止大

① 侯宜杰：《袁世凯三部曲·第一部逞威属邦》，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39页。

②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20页。

院君之护从人员。随后，吴长庆擒拿下大院君，并由丁汝昌连夜送到南阳府，再由兵船押往天津。为了免于滋生更多事端，袁世凯等带上亲兵，雨夜巡视各主要街道和王宫周围，未发现异常后，才回营休息。再接下来的惩治“乱党”中，袁世凯也出力颇多。他先是与马建忠商量如何铲除“乱党”，甚至还主动请命亲任枉寻里之战的总指挥。枉寻里之战结束后，壬午之变算至此平定。

壬午之变平定后，朝鲜国王设宴款待，礼遇袁世凯，甚至为其设立生祠。清政府也对平定“壬午兵变”有功人员进行奖赏，袁世凯因“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晋官同知发分省补用，赏戴花翎。九月，朝鲜国王派使者向清政府致谢，并要求清政府派出教习，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李鸿章命吴长庆筹划。吴长庆派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草创章制，编选壮丁”，选 1000 人，分左右营，按准军操法训练，武器准备由中国供给。朝鲜国王检阅后，极为满意，称赞袁世凯训练有方。决定在江华沁军营中再选 500 名编为“镇抚营”，仍由袁世凯训练。“袁世凯编练韩军的重要性虽不及他日后的小站练兵，却也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次练军可说是壬午事变后中国在韩势力急剧发展的象征，同时也显示袁世凯在庆军中的地位。”<sup>①</sup>

袁世凯厕身军界，本属无奈之举，但确实天赋所在，在吴长庆的提携之下，短短几年，已锋芒显露，崭露头角。

## 机智果敢，可谓能矣

古代中国确有中央之国、天朝在上之象，属国众多，进贡纷纷。早在汉晋时期，就有林邑（今越南中部地区）、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等国前来称臣纳贡。到了明清时期，安南（今越南）和朝鲜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朝贡国。当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后，不断向外扩张，越南与朝鲜都成了它们侵略的目标。越南被法国盯上，而朝鲜更是先有荷兰传教士的基督教传播，尔后有法国的入侵以及美国的通商要求和入侵。而日本，则想把朝鲜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上，独吞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侵朝政策日益明朗，随后有 1876 年的日朝《江华条约》，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并互派使节等。日本想通过承认朝鲜独立，把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废除，进而谋取它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对于《江华条约》的签订，中国没有提出抗议，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朝鲜的唯一宗主权。后来，清廷自觉不甘，遂命李鸿章主管朝鲜事务，代替在传统上

<sup>①</sup>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28页。

负责朝贡关系的礼部。李鸿章的外交策略长期以来是“以夷制夷”，在夷与夷之间走钢丝绳。在李鸿章的推动下，美、英、法、德等国先后与朝鲜签订条约，承认朝鲜独立。但朝鲜另外发表单独声明，自称为中国属邦。中国当然也愿意继续充当朝鲜的保护国、宗主国。所以壬午之变后，清政府就在第一时间出兵朝鲜，继续对朝鲜行使宗主国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如此，庆军在朝鲜才有所作为，擒拿大院君，平定乱党，训练新军等，也正是这样才有袁世凯的一番作为。

壬午之变平定后，吴长庆奉命回国，带回一半军队，剩下三营由吴兆有统领。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兼带庆字副营，并办理转运和一切留防事宜。张光前仍任后营营官。吴兆有、张光前并非袁世凯的对手。吴兆有虽然名义上统领三军，但斗不过袁世凯，能力也在袁之下，“中国在汉城有驻防军朝三营，名义上是统带吴兆有管辖，实际上则由袁世凯所节制”<sup>①</sup>；张光前虽然位居正二品，是个总兵，但只有五品的袁世凯却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次朝鲜国王李熙接见张光前和袁世凯，袁世凯居然抢在前头，坐上客位的首座，俨然不把张光前当回事。当然，这也反映了袁世凯年轻气盛，少年得志，狂妄跋扈的一面。但袁世凯确有独挡一面之能事。

壬午之变平定后，朝鲜看似平静，其实朝鲜已经被推到了国际的激浪中。中国虽然平定了叛乱，擒拿走了大院君。但日本亦有收获，1882年8月，日朝签订《济物浦条约》。《济物浦条约》是《江华条约》的延伸，日本不断强化了对朝鲜经济、政治的控制，而且强化了军事的影响力，日本使馆取得在朝的驻兵权。在朝鲜朝廷内部，斗争也是越来越激烈，特别是事大派与开化派之间的斗争。事大派亲华，以闵泳翊为首领；开化派亲日，以金玉均、朴永孝等为首。两派自分畛域，相互倾轧。光绪十年（1884年），开化派的活动日益猖獗起来，与日人大肆活动。金玉均等人认为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自顾不暇，便寻机刺杀事大派首领。袁世凯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命各营严加戒备，同时与朝鲜军队将领不断研商防范之策，此外



朝鲜国王李熙

<sup>①</sup>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2页。



朝鲜王宫

还电请李鸿章指示机宜。

1884年10月，金玉均、朴永孝等人与日本驻朝公使竹添申通好，决定利用庆祝朝鲜邮政总局新厦落成的晚宴举事。随后，政变集团挟持国王到景佑宫，同时迫使国王召请日使进宫保卫。日本公使率日军一百余人支持开化派，冲入朝鲜王宫，捕杀事大派闵泳穆、闵台镐、赵宁夏等大臣。国王被挟，事大派大臣被杀，政府全由开化派主导，并公布了亲日的政府名单。袁世凯知道后，非常着急，深知这将关系中朝属番关系，关系中国在朝

的根本利益，遂连续几日与吴兆有、张光前商量对策。在国王生死不明、政变已经大体明了的情况下，袁世凯慷慨激昂，主张应该举清兵入宫，营救出国王。而吴兆有、张光前显然怕担当责任，以没有北洋的命令，决不能擅自行动为由，不同意出兵。无奈，袁世凯一面做举兵的准备，一面致函旅顺的保龄，托他禀请“即派兵轮来东”，接着又上书李鸿章，请求派兵支援，以防不测。随后，袁世凯再次强调事态危急，不能再等，主张应先出兵营救国王，而后电告北洋说明原委。吴兆有、张光前显然还是拿不定主意，袁世凯遂云：“驻防的对外交涉，是我的专责，如果因为肇衅获罪，由我袁某一人承当，决不累及二位。”<sup>①</sup>于是袁世凯自担最危险的进攻敦化门任务。袁世凯为了能顺利进攻敦化门，先设法与守护王宫的朝鲜左右两营取得联系。这两营人马多是袁世凯当年训练的，虽然政变发生后，这两营的主帅被杀，换了开化党的人指挥，但袁世凯找来左营的金钟吕、右营的申泰熙，晓以利弊，做通他们的工作，请他们给予支援。

进攻敦化门当日，袁世凯致书日本公使竹添，谓：“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设国王。日昨朝鲜内乱，杀害大臣八九人。现在城内外军民不服，举有入宫环攻贵部之说。弟等既恐国王复惊，又恐贵部受困，用敢率队进宫，一以保设国王，一以援设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sup>②</sup>袁世凯发函后，不见竹添答复，

<sup>①</sup> 侯宜杰：《袁世凯三部曲·第一部逞威属邦》，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114页。

<sup>②</sup> 转引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9页。

遂于当日下午，断然发动攻击。袁世凯自率一队进向敦化门，吴兆有率队由宣仁门向昌德宫进军，张光前所部为预备队，在后策应。当年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记录这一历史事件时，多有气愤，称：甲申之变，韩京大乱，韩王恐怖，照会我竹添公使保护。袁世凯闻变，遂率兵往袭王宫，以我公使在宫中，乃致书我公使。“书甫入，我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我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与我军相接。清众我寡，势不敌。我公使势甚危。”<sup>①</sup>袁世凯的果敢、勇于担当，给日军以重大打击，竹添知道大势已去，逃出王宫，回到公馆，翌日，该馆受到朝鲜人民的袭击，竹添见势不妙，最后逃往仁川。袁世凯带兵入宫的目的，原在保护国王，但入宫后，并未发现李熙的下落，办事急躁的袁世凯有另立国王的建议，但遭吴兆有驳斥。袁世凯也自觉不妥，没有坚持。随后，有人来报，国王在关帝庙。吴兆有、袁世凯立即带兵到关帝庙营救出国王。李熙先入吴营，下诏重组政府，随后移驻袁营，再后袁世凯等护送李熙重回王宫，甲申政变结束。“在此次变乱中，从出兵的决定，到军事的部署与攻击行动，甚至事后局势的收拾（把持韩政，操纵与日方交涉等），实际上全系袁一人独断专行。统带吴兆有、总兵张光前虽也联衔参与其事，然与陈树棠同样只不过具名而已，可说一切都出于袁。”<sup>②</sup>



日本明治维新是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东南雄藩的武士推动的，故维新后即由他们掌握新政府的实权。当时当权派的岩仓贝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出使外国，而成为所谓的“留守政府”（外出不在称为留守），于是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等参议，即纷纷起来主张征服朝鲜或远征台湾地区，争论的结果，经朝廷决议先行征韩。图为板垣退助。

甲申之变，是中日士兵在朝鲜的第一次正面交火。袁世凯深知，中日交兵，必然牵涉外交问题，遂安排朝鲜国王在营内引见各国公使，说明事乱原委，并请共同调处。后又请陈树棠与各国公使晤商调处，但调处效果甚微，竹添态度尤为强硬。后竹添返日禀告，对事件添油加醋，日本军部之内的萨摩派系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而井上公使力排众议，主张与中国进行谈判，但中日摩擦已日益加深。而

<sup>①</sup> 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73页。